

清史探秘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文化报社办



道光皇帝

清廷的中央财政，除皇帝的个人花销由内务府负责外，其余部分均归户部管辖。为了管理从全国各地征收上来的银钱、实物等税收，户部特设立三个大库，即银库、缎匹库、颜料库，分别存储各省每年解往京师的税银、绸缎布匹、以及铜、铁、铅、锡、颜料、药材等项物品，合称“户部三库”。简而言之，户部是清政府的财政中枢，户部银库则是专门为皇上保管银子的机构。

清朝的财政状况，在乾隆以前形势尚好，乾隆末年以后，财政日益困难，至嘉庆朝，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朝廷连年用兵，致使国库空亏，捉襟见肘。至道光年间，财政愈加败坏，特别是平定张格尔叛乱，黄河数次决口和鸦片战争三大财政耗案之后，又发生了本文所要叙述的震惊朝野的户部银库被窃案。

分赃不均爆大案

道光二十三年(1843)，由于管理银库的大小官吏分赃不均，内耗起来，事情越闹越大，无法掩盖，终于传到了道光帝那里。户部张诚偷盗银库案遂遭曝光，并由此爆出道光朝乃至有清一代最大的银库盗窃案。道光帝震怒，谕

得三四万两银子，因此被视为“肥缺”。库兵轮流搬动库银，每月总会进进出出四五次。每逢搬库，无论寒暑，库兵都要裸体，从堂官前鱼贯而入，入库后穿上预先准备好的工作服。搬运完毕，脱下工作服，裸体而出，至大堂前再次接受检查。检查时，库兵要伸两臂，露出两肋，两腿微露，并张嘴学鸡叫，以防止他们有所夹带。通过检查后，才能外出。相传，库兵职业乃家世相传，他们从小就练习用口门夹物，先练习夹鸡蛋，再依次换成鸭蛋、鹅蛋，以至于铁蛋。到最后，一个库兵每次可夹带大约十枚光滑的银锭，重百两左右。每逢出入银库，库兵们即将银锭夹带而出。库兵偷盗库银，毕竟是雕虫小技，比起管库的大员，实在是小巫

之仆从门包亦可得银300两。然而，其中也有廉洁奉公者。道光帝曾钦点给事中陈鸿前往户部银库稽查。陈妻得知消息后，对陈鸿说：“今后，你就把我送走吧！”陈鸿吃惊地问她缘由。其妻回答道：“银库是个美差，一旦沾染上银库中的恶习，必有许多人逢迎而至，灾祸也就不日降临，我不忍心见到你被皇上斩首啊！”陈鸿闻言，对天发誓，表示绝不受贿。这时，陈鸿家中摆着几盆花，不慎被陈鸿碰落打碎一盆，露出藏在其中的银钱。陈鸿见状，知道事有蹊跷，不免心慌惧怕。他到任后，采取措施，淘汰量银出入旧秤，另选精铁重新制秤，多方校验后方可使用；禁止挪压筒银，禁止空白出纳；请户部逐月移送收银总簿，另立放银簿，并

盗案案查清，道光帝重新组织了清查班子，派宗室载铨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敬徵、兵部尚书裕斌、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赛尚阿前往核实查办，对所有自嘉庆五年以后的历任管库司员、查库御史及库丁书役等，逐一查明，开列名单，从严治罪，并对短亏库银如何设法弥补的办法，以及如何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，提出具体意见。当然，他也明白，“惟事阅多年，官非一任，即书吏、丁役等，亦人数众多，倘不确切查明，恐致漏网，幸逃法网”。

当时离鸦片战争结束不远，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本来就十分困难，现在又发现户部银库只有200多万两的储备，一旦遇有变故，实在无法应付，道光帝自然十分焦急，向内阁连发两道明谕：其一，要求清军官兵于各项需用，一概从俭，甚至要俭而再俭，兵丁军饷如不能按数发给，将来一定照数补发；其二，要求宗人府、户部、工部、内务府、三院、三山、太常寺、步军统领衙门、顺天府各堂官对所有大小工程及支领款项，可裁即裁，能省就省。

三月三十日，与库案有关的历任管库司员、查库御史名单开列出来，呈报道光帝。道光帝再命吏部，将这些入中现有官职或因故回籍回籍人员一律先行革职；已故者，继续彻查其子孙有无任职及现任何职，然后开列名单，交载铨、穆彰阿、敬徵、裕斌、赛尚阿从速查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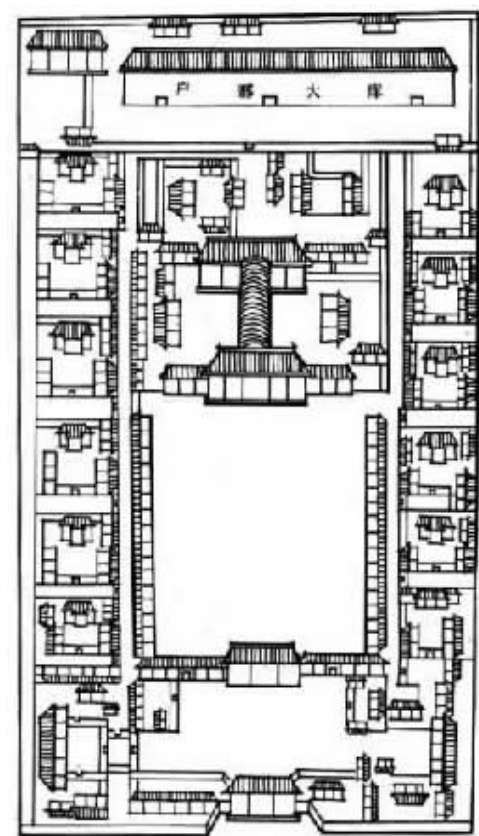
四月七日，道光帝对银库案有关人员实行经济制裁：一、自嘉庆五年至道光二十三年历任库官、查库御史，各按在任年月，每月罚赔银1200两，已故者照数减半；二、因此次库案已经革职的庆荣等六人和尚未卸任的萨霖、宋林曙均加倍罚赔；三、嘉庆以后历任管理银库的王大臣，每月罚赔银500两，历任查库王大臣，每次罚赔银6000两，已故者照数减半。

道光帝对银库案的处理是比较认真的，态度也是坚决的，就连最受他信任的军机大臣、大学士们，也不能幸免。比如道光朝身任宰辅多年的三朝元老、深受道光倚重的大学士、军机大臣曹振镛，也因库案所涉，被减半罚赔银2万余两，其人虽已去世，由其子照数赔补。其子赔补1万两后，因病身亡，又改由其孙继续补缴。曹振镛如此，其他人不问可知。

此案虽然处罚了许多人，但最后的结果却并不理想。道光帝起初打算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革职，但考虑到涉案人数实在太多，如果一锅端掉后，恐职事无人接手，最终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全部从宽处理，将革职改为留任，只是把查库御史全部取消。至于管库制度，则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进。这起从来未有的银库盗窃大案就此了结。

清朝最大的银库案

倪玉平



清代北京户部衙门及大库图

令刑部尚书惟勤等人前往盘查银库，并一度亲自参加审问，最终获得全部真相。

银库汇集了全国历年来的税收银两，守备自然格外森严。银库由郎中负责，三年一任，大都从中渔利甚多。郎中以下，司库、书吏、兵役人等，也无不以此为利藪，其中尤以库兵为甚。库兵都是满族人，也是三年一换，通常一任可窃

加盖印信，以便考核。管库人员想把陈鸿拉下水，千方百计引诱他，陈鸿不为所动。但是像陈鸿这样的廉吏当时可谓凤毛麟角。

涉案人员众多 只能从宽处理

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，刑部尚书惟勤等向道光帝详细汇报查银库的统计结果。惟勤等人称，经过查对户部送来的会计簿，银库应有历年积余的正项银12182116两。而经逐袋查验后发现，仓库中只有存银2929354两，共计短少9252762两。面对这份奏折，道光帝愤怒地朱批道：“朕愧恨忿急之外，又将何喻！”

同一日，道光帝对内阁发布上谕称：“户部银库设有管库司员，专司出纳，管库大臣总领其事，并多次派出王大臣查库。近年又添设查库满汉御史，各该员果能认真经理，核实稽查，何至群相蒙混，酿成巨案？”现在银库竟空至900余万两之多，“实属从来未有之事，竟奏朕甚忿恨”。自嘉庆五年(1800)以后历任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大臣，皆系亲信大员，竟毫无察觉，甚负委任，“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？朕自咎无知人之明，抱愧良深”。

为了把这一前所未有的特大

见大巫。一方面，库吏动辄几十万、上百万地“移用”；另一方面，户部银库自乾隆时期和坤当国后，就没有认真清查过。嘉庆年间，虽然朝廷派过专员盘查，但由于受到库吏的贿赂，无不含糊奏，含混了事。随着吏治的腐败，库内侵蚀的情况愈发严重，有人说，“子而孙，孙而子，据为家资六十余年矣”。据欧阳昱的《见闻琐录》记载，嘉道时期，银库已经形成一套陋规体制，一旦逢皇上命御史清查银库，库官必献上规银3000两，御史

文摘

大宋王朝。以文治国，这是大宋开国皇帝、出生于传统武将门庭的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方针。为了让后世子孙彻底贯彻他的精神，他还留下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遗训，并将其刻在一块石碑上，藏于深宫密室。每当新帝即位时，一个秘密仪式便是恭读遗训。密室只有皇帝可以进入，因此包括重臣都不知道“石刻遗训”的存在，直到宋太祖死后150年，汴梁被金兵攻陷，这块石碑才发现。宋太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什么呢？

“不得以言论之，故，处死士大夫。”

遗训只有两句，这是其中之一。试想一下，一位君王在为自己安排后事时，该有多少千叮咛万嘱咐的事。宋太祖偏偏留下了这么一句“传家宝”，可见他有特殊用意。或许他认为，文人再怎么胡说八道，也不会造反，所以尽可以让他们自由发言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个遗训的好处显而易见，那就是文人扬眉吐气，翻身作主。文人气氛如此之浓，所以很难不把一切事关风雅之事都发展到极致，这其中就包括男子戴花。

说到簪花，除了鲜花，宋人还戴人造花。有一种是用琉璃制成的，度宗时，官中即流行簪戴琉璃花，世人争相仿效。有诗人便赋诗道：“京城禁珠翠，天下尽琉璃。”琉璃——流离，有识之士认为这是“流离之兆”。确实，度宗死后5年，南宋即告灭亡。

(摘自《中华遗产》杂志2008年10月)



“鬓边长插四季花”的浪子燕青

文摘



“一枝花”蔡庆

男人戴花古已有之，不过不甚普遍。明清时期，偶有为之。惟有两宋，男人戴花蔚然成风。不信，回头再去读一遍《水浒传》，会发现梁山好汉简直就是“花团锦簇”：

病关索杨雄，“鬓边爱插芙蓉花”；浪子燕青，“鬓边长插四季花”；阮小五“斜戴着一顶破头巾，鬓边插一朵石榴花”；而刽子手、满脸横肉的蔡庆，生来爱戴一枝花，于是人家干脆叫他“一枝花”蔡庆……

小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，大宋民间如此肆意地戴花，当然是有官方的时尚潮流在前面引领。其中最时尚标杆作用的当数风流君主宋徽宗。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，都是“御裹小帽，簪花，乘马”，从驾的臣僚、侍卫，也都簪花簪戴。徽宗不仅崇尚戴花，还要制定一些规则。他赐给随身的卫兵每人衣袄一领，翠叶金花一枝，有官花锦袄者，才能自由出入大内。男人簪花发展到宋朝，几近极致，一朵小小的簪花，甚至成为上层社会身份的标识、等级的象征。在宋代重要的史料笔记《铁围山丛话》里，对此有详细的记录。每逢重大节庆，例如郊祀回銮、宫廷宴会和新进士同喜宴等，皇帝都要赐花给臣僚。皇帝赐给臣僚们的簪花还分品位：生辰大宴又有辽使在场时，用绢帛花；春秋两宴，用美丽的罗帛花；陪同皇帝游玩的小宴，则用精巧的滴粉缕金花……赐花时，还按官员的品阶决定多少，可谓尊卑有序、多寡有数。

“春色何须羯鼓催，君王元日领春回。牡丹芍药蔷薇朵，都向千官帽上开。”这是诗人杨万里的戏作，却可以从看到一个被花海浸泡、淹没的

锡伯族是一个生活在东北，长期以渔猎生活为主的民族，在锡伯族人中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些原始信仰，对“喜利妈妈”的信仰就是其中之一。

清朝乾隆年间，清政府平定准葛尔叛乱后，为抵御沙俄东扩，将生活在东北的一部分锡伯族人调往新疆，戍守边境。1764年农历四月十八日，在今沈阳锡伯家庙举行完离别仪式后，4000余名锡伯族官兵和他们的家眷便踏上了西迁的征途，这部分锡伯族人也同时将家中的“喜利妈妈”带到了伊犁。如今，锡伯族的许多古老民俗在其发源地东北已很少见，2007年，“喜利妈妈”入选沈阳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而这一锡伯族民俗在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也依然可以找到。

“喜利妈妈”是由“喜仁妈妈”演变而来。在锡伯语中，“喜仁”是“藤蔓系”的意思，“妈妈”则为奶奶、老娘。合起来意为“世系奶奶”，是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的神灵。“喜利妈妈”是在一根长约10米的丝线上悬挂上小弓箭、箭袋、摇篮、铜钱、布条、嘎拉哈(猪羊的背式骨)、木锹、木叉等物，每件都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。两个嘎拉哈之间代表了一辈人，小弓箭表示男儿，添一男孩，两个嘎拉哈之间就添一张小弓箭，象征孩子长大成为游牧的勇士、作战的骁将；箭袋表示男儿长大之后，成为骑射能手；布条表示女孩，象征她长大后成为缝制衣物及操持家务的能手，这一辈有几个女孩，就有几块布条；摇篮、小靴鞋等表示子孙满堂；铜钱表示生活富裕；木锹、木叉等表示农业丰收。

“喜利妈妈”通常供奉在西屋内的西北墙角，平时将其拢在一起，用纸包好，每年除夕将“喜利妈妈”请下，将丝绳拉开，从屋内的西北角扯到东南角，把绳的两端挂在房椽上，摆上供品祭拜，直到农历二月初二，再将“喜利妈妈”拢在一起，用纸包好，放回原处。在没有文字的时代，“喜利妈妈”实际上成了锡伯族的家谱，是家族繁衍的标记。制作“喜利妈妈”所用的材料，要到本村人口多、辈数全的家户去挑，并邀请家族中年纪最大、子孙满堂的人来制作。立“喜利妈妈”，要举行隆重的仪式，要杀猪宰羊，请全族人参加祭

祀仪式并设酒席款待。关于“喜利妈妈”的传说有几种不同的版本，其中一个版本带有神话色彩。传说远古时候，锡伯部落出动围猎，留下老人和18个孩子，族人把小孩装在皮口袋里，挂在树杈上，由一个名叫喜利的姑娘照看着。围猎族人一直不归，喜利姑娘战胜各种困难，把孩子们抚养成人，保护了锡伯部落繁衍兴旺。玉帝认她为女儿并封为“喜利妈妈”，“喜利妈妈”由此成为锡伯族的女祖先。另一个传说则带有一些历史背景。锡伯族发源于历史上的鲜卑人，南北朝时期，平定北方有功的平陵侯范朋友偶然发现小奴奴脚下生有5颗红痣，认为他必定是真龙天子，决定杀死拓跋毛以绝后患，却不料被家中的老管家喜利妈妈知道，同为鲜卑人的喜利妈妈将真相告诉拓跋毛，帮助他逃过家难，拓跋毛逃入东北的深山老林中，找到族人并联合诸部，奠定了北魏政权的基石。拓跋毛后来率精兵专程来老家喜利妈妈时得知，当年他逃走，喜利妈妈因不堪严刑拷打已去世。悲痛的拓跋毛封喜利妈妈为女神，神位便设在了居西西屋西北角，让族人永世供奉。

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，几乎所有民族的古老传说中都有一个被神话了的女人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古老民族希望本族繁衍旺盛，战胜严酷的大自然，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。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，她们渐渐成为一个民族祈求人丁兴旺的图腾标志之一，“喜利妈妈”作为锡伯族的原始崇拜之一，也成为民族兴旺的图腾。

喜利妈妈 锡伯族的兴旺图腾

顾新勇



锡伯族老人在悬挂“喜利妈妈”

2009年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中国项目选萃

西安鼓乐——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

许德宝

由于演奏者多是质朴农民，长期接触和不断吸收当地民间音乐，因而演奏的乐曲音调高扬热烈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西安鼓乐依附于民间的“迎神赛会”及民俗中的祈雨、庆贺等活动，形成了“行乐”与“坐乐”两种不同仪仗、仪式和曲目的表演形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“念词”，即在庙会中时常表演的声乐部分。其乐队以管子、笛子主奏，编制为笙、管、笛、鼓、板、铙、钹，其中鼓掌握着全曲的起落和节奏变化，真正起到了乐曲中鼓魂的作用。乐队建制一般在30人左右，最多可达50人。

西安鼓乐是一个曲调丰富、结构严谨、风格鲜明、价值极高的古老乐种。

曲调丰富。西安鼓乐的曲目众多，现存的3000多首曲目中，已整理出20余类1100多首，包含了9世纪以来唐宋大曲、宗教吟唱、戏曲曲音乐、民间小调等极其丰富、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曲目和曲谱。

结构严谨。结构严谨是西安鼓乐的显著特征，鼓乐与乐曲紧密结合，鼓点的击法并非由鼓师随心所欲，而是依照乐曲的内容、结构进行有机的配合。“坐乐”结构均为套曲，分为“花鼓段坐乐”与“八拍鼓段坐乐”；行进或站立演奏的“行乐”则统用牌子曲。

风格鲜明。首先，就乐种而言，西安鼓乐主要采取了中国传统

统的四宫体系，是中国乐律学史技术理论的集中体现，保持和发挥了传统宫调体系的运用原则，同时也保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节奏、节拍的形制和特点。另外，西安鼓乐是以“娱神”之名而行“娱人”之实——迎神赛会成了庙会上的“斗(赛)乐”活动，而“斗乐”的目的则在于展示技艺，切磋琢磨，不断提高演奏水平。这种“赛会”至今绵延不断，近年来更有复兴之势。

价值极高。西安鼓乐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传统民间器乐合奏乐种，它的宫调体系、谱式体系、曲目内容及来源、结构形



鼓乐表演艺人

西安鼓乐是吹奏乐和锣鼓乐有机结合的大型合奏乐古老乐种，主要流行于西安市城区的碑林、莲湖、新城区以及郊区的长安区和蓝田、周至县等地，民间多称为“细乐”，将从事这些演奏活动的班社称为“细乐社”或“古乐社”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西北音乐家协会组织专家学者对该乐种进行调查、记录和整理；1953年，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派专家对该乐种再次进行调查，针对该乐种的个性特征，将其正式命名为“西安鼓乐”，沿用至今。

西安鼓乐的渊源历史上并无明确的史料记载，不过，西安鼓乐保存着大量唐曲名录中的曲谱，有着暗合唐代大曲结构的大型套曲，而且在记谱方式上一直使用宋代流行的工尺谱。西安鼓乐的盛行应在清朝的康乾盛世，现存最早可信的曲谱集为康熙二十八年，即1689年的民间乐社手抄本。新中国成立前后，仅

西安城内就有20余家乐社在活动。“文革”期间所有乐社活动几乎中断，后又逐步恢复，现今，从事西安鼓乐活动的乐社主要有城隍庙鼓乐社(莲湖区)、何家营鼓乐社(长安区)、南集贤东村鼓乐社(周至县)、东仓鼓乐社(碑林区)以及大吉昌鼓乐社(碑林区)6家。

西安鼓乐根据各乐社的分布和师承关系、曲目及演奏风格等，分为僧、道、俗三派，各家各派的风格是由各乐社艺人传授曲目的不同而形成的。现主要活动的6家乐社的成员包括农民、教师、退休工人、学生等，每个乐社都有自己严格的师承关系，代代相传。如以程金林、赵展辰等为代表的东仓等僧派乐社，演奏的乐曲音调高昂、热烈而悠扬；以安来绪等为代表的城隍庙等道派乐社，演奏的乐曲音调低迥、厚重、平和幽雅；以文明等为代表的周至县南集贤等俗派乐社，



孩子们在学习吹奏鼓乐